建立与新时代乡村“适配”的文学表达

——河北乡村题材创作探析

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A

□赵振杰

河北作为一个乡土文化底蕴深厚、红色革命文化灿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显著的农业大省，有着优良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和丰富的农村生活题材创作经验，曾孕育出许多蜚声文坛的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河北文学一度引领着时代潮流，走在中国文坛最前列。农村生活题材是这一时期除革命历史题材外尤为重要的创作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反映农村政治经济生活巨大变革、农民精神面貌深刻变化，讴歌新中国农村新面貌的优秀文学作品，如孙犁《铁木前传》、李满天《白毛仙姑》、谷峪《新事新办》、申跃中《一盏抗旱灯下》、张峻《尾台戏》、潮清《合婚台》、张朴《水上姻缘》、张庆田《“老坚决”外传》等。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河北文坛出现新风尚，以孙犁为旗帜，以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为创作主力，活动范围覆盖京、津、保等地的“荷花淀派”成为当时河北乡村题材作品的代名词。

新时期以降，河北乡村题材创作又迎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谈到这一阶段的文学态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铁凝成为河北文学的一面旗帜。她的创作既继承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创新发展。《哦，香雪》以乡村一角展现时代进程，成为河北乡村题材创作继往开来的风向标。除了铁凝，新时期河北乡村题材创作队伍主要由三个梯队构成。第一个梯队的领军者无疑是贾大山，第二个梯队的代表人物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第三个梯队的代表人物是“河北四侠”之一的胡学文。他们自觉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扎根燕赵沃土，紧跟时代步伐，助力改革开放，深刻描绘了广阔的河北乡村社会生活图景。《大浴女》《笨花》《取经》《村戏》《九月还乡》《天高地厚》《麦子的盖头》《极地胭脂》等一系列小说，成为当代河北乡村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党的十九大以来，广大河北作家继承乡村题材创作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围绕脱贫攻坚开展主题创作。近年来，反映脱贫攻坚的作品达1000余部（篇），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个门类。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入选第六届我最喜爱的河北十佳图书；李春雷的脱贫攻坚题材书写，既有关注河北脱贫攻坚实践的《大山教授》，也有聚焦甘肃定西精准扶贫的《妮妮下乡》，生动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担当的新时代扶贫干部形象；郭靖宇、杨勇创作了脱贫攻坚题材剧本《最美的乡村》，其同名电视剧2020年在央视播出，获得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

河北乡村题材创作硕果累累，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所有乡村叙事存在的痼疾一样，作家需要对以下两种创作倾向予以充分警惕。

一是田园牧歌或乡土挽歌式的极端化叙述。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河北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进乡村，或许还能看到“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牧歌景象，然而这绝非是当前河北乡村的全貌，一味采用古典诗意笔法为乡村生活涂脂抹粉显然不合时宜；而作家如果戴着“墨镜”、怀着偏见，以唱挽歌的心态无限放大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亦无法全面客观地表现河北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历史的磅礴运动塑造着新的乡村社会与生活，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自觉融入改变乡村面貌的伟大实践之中，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乡村题材精品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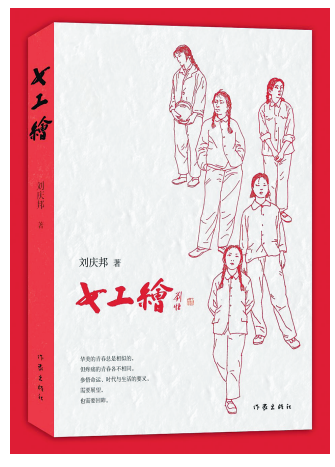
二是走马观花式的猎奇化、景观化书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村是中国的根脉。不熟悉中国的乡村和农民，就无法弄懂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然而一些作家还是会打着“深扎”、采风的旗号，以游客的身份与心态走进乡村。到了、转了、看了，就自认为了解了乡村，了解了农民，以至于部分乡村题材作品存在明显的表象化、模式化、浮泛化问题。更有甚者为满足他者猎奇心理或者市场需要，故意采用单一化、极端化的叙事方式，将乡村塑造成一派“田园景观”或“荒原景观”，以此来吸引眼球。生活经验的匮乏、职业操守的丧失，必然导致作品的干瘪与粗俗。有鉴于此，新时代的乡村抒写，需要作家提升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做到身入、心入、情入。

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的新乡村，召唤着我们迈开双脚走进去，但走进去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结构，开拓思维视野。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猎奇化、景观化的方式，都不足以表现中国乡村的全貌。新的时代内容需要新的形式，面对新时代的乡村现实，寻找与之“适配”的文学表达，这是当前每一位乡村题材创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为当代作家开展乡村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丰富的素材。新时代、新农村的抒写和记录，河北文学不应缺席也不会缺席。河北作家应充分发挥文学在“扶智”与“扶志”方面的独特优势，持续提升艺术创作能力和认知新鲜事物的能力，尤其是新时代中国乡村经验的能力，努力塑造乡村新农民，书写时代新史诗。

为一代矿场女工的青春『塑像』

——评刘庆邦长篇小说《女工绘》



□韩浩月

已经出版过《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三部煤矿题材长篇小说的著名作家刘庆邦，创作了第四部同题材长篇小说《女工绘》（作家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题材的重复并未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相反，刘庆邦在书中流露出来的年轻心态，使得这部小说充盈着灵动之感。

《女工绘》写的是后知青时代一群青年矿场女工的故事。小说以华春堂找对象的曲折过程为主要线索，串联起多名矿场女工的不同命运，写她们的青春，写她们的爱情。全书21章，像由21个精悍的短篇巧妙连缀而成，可从中读到煤炭的哲学、麦浪的诗意、世俗的烟火气、凡人的众生相……作品以平实的笔触、可感的细节和入微的心理描摹，勾勒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世俗人情。

那是一段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因了刘庆邦的生动描写，时间胶囊被打开，精彩故事得以上演，华春堂、张丽之、杨海平、陈秀明、唐慧芳等女工缓缓走来……故事情节集中于煤矿——从宿舍到食堂，从会场到矿场大门口，书中的场景描述，提供了“舞台”般的展现效果。

小说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刘庆邦书写了那个年代物质的匮乏，居住的简陋，矿下工作危险、紧张的氛围。他在开篇写大地，写自然，写煤香和麦香，其实也是在奠定整部小说的审美基调。如今回望过去，那段岁月留下的美更多、爱更多。

小说伊始的大篇幅环境描写，也是在为主人公华春堂的出场作铺垫。她是家里的二女儿，理应是无忧无虑、活泼烂漫的性格，但是家庭的变故和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却让她心智老成、精明有谋。她可以轻易看穿人心，并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安排”自己到灯房、宣传队、化验室等相对轻松的地方工作。在择偶方面，从李玉清到魏正方再到卞永韶，三个优秀的男青年，在三个阶段，或多或少都喜欢上了她，而她却始终精准地掌握着分寸与节奏。她迈出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精打细算，除了自己的行动，也包括对别人的试探。可是作为读者，并不会对这样的华春堂有所排斥，反而满是同情，主动站到她的立场、她的处境去理解她的所有选择。华春堂是可爱的。她可爱，因为她真实、透明，她的小心思和小目的，旁人都知道，但都不忍说破且愿意成全她。她总是想在困苦的环境里追求更好的生活，向着阳光无畏前行。她的追求总闪烁着美好的光芒，且丝毫没有伤害到别人。在这部故事背景深沉阴郁的小说中，华春堂是一位周身散发着光芒的女性人物，带给读者无限暖意。

《女工绘》是一幅矿场女工群像，不只有灵动多思的华春堂，还有寡言克制的周子敏、憨直倔强的唐慧芳、漂亮开朗的张丽之、清澈动人的杨海平……“‘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在我看来，每个青年女工都有可爱之处，都值得爱一爱。”刘庆邦在《女工绘》的《后记》中写道。书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都有原型，她们是刘庆邦的工友。小说里，华春堂的生命戛然而止，现实中同样如此。刘庆邦的心灵一度因此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但他没有借助虚构的魔力在小说里为之安排另外的命运结局。生命是时代的容器，华春堂的命运走向看似偶然，也有其必然性，看上去像是自然发生的，但在那个年代别无选择。“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场悲剧。”在刘庆邦看来，人们都喜欢花好月圆，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悲剧才更真实”。60岁之后写《女工绘》，刘庆邦多了份坦然，或是因为有这份坦然，他才可以走出悲伤。

在河南某县城一处煤矿工作生活过的女工们，她们的青春被刘庆邦锁定在一个时空胶囊里，在那里，她们永远年轻，用青春的欢笑与气息驱散着煤矿的沉重与压抑。这个时空胶囊，是时代的标本，刘庆邦倾注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人生、对人性、对社会、对世界的深邃的凝望、思考、沉积与领悟，因此，《女工绘》是一部厚积薄发的“美之书”“痛之书”“爱之书”，也是一部凝深情与思悟于一体的“生命之书”。

展现小人物的民族信仰

——评海飞长篇小说《醒来》

□章雨恬

在《向延安》《捕风者》《麻雀》《惊蛰》之后，海飞推出他的谍战新作《醒来》（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谍战故事。

书中的主人公陈开来原是杭州春光照相馆的学徒，因目睹师父李木胜被日军杀害，决心前往上海接替李木胜，成为共产党特工。在舞女金宝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陈开来照相馆”。随后，陈开来与远房表姐沈克希和汪伪政府人员赵前组成“西湖三景”小组，秘密搜集关于“沉睡计划”的消息。而另一方面，汪伪政府的卧底黄杜桥在上海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令各方势力损失惨重。随着战友赵前和沈克希的相继牺牲，金宝为军统间谍的身份暴露，陈开来的处境愈加艰难……

小说人物设置精巧，每个人物都携带着庞杂的信息。作者开篇对一组人物进行了概述，几乎每一个场景的转换，都伴随着相应人物的出场和一个新视角的进入。而待到陈开来初入上海，苏门、崔恩熙、苍广连、赵前、李默群等人迅速登场，让读者感到应接不暇。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都埋藏了伏笔，他们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往事和秘密。以舞女金宝为例，表面上没心没肺、终日花天酒地，实际上却是汪伪政府苦心寻找的军统高级间谍。金宝的身份转变是小说中最出人意料的，但仔细想来也并不让人感到突兀，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作者早就通过某些细节暗示了陈开来身边的人并不简单。

与很多谍战小说着力刻画主角的谍战事迹极不相同的是，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陈开来入党以前的生活，来揭示陈开来乃至更多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仰产生的缘由。陈开来的成长主要有两种因素，一方面是革命前辈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这和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成长轨迹相似。陈开来的师父李木胜的英勇就义促使他产生报国的志气，接着陈开来目睹了赵前为掩护自己而选择牺牲，沈克希为守护机密而忍受极刑，崔恩熙为保护苏门壮烈牺牲，这些都是让陈开来坚定革命信仰的理由。革命战友先后牺牲，让他必须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即使面对的人是深信他并救过他的黄杜桥和与他朝夕相伴、对他爱之入骨的金宝，他也要割断与他们之间的情感游丝，守护心中的正义。

书中不仅展现了谍战的云谲波诡，还再现了孤岛时期的上海风貌。小说主人公陈开来的本职是一名摄影师，走到哪儿都不忘带上相机。他就像一个时代的记录者，用相机定格那个时代的悲哀与热血。作者曾在上海生活，十分熟悉城市布局，且在创作前又对上海的那段历史进行了严谨的考据，这使得他能够精准还原当时上海的城市生活图景，他的文字常常具有强烈的画面感，犹如陈开来相机记录下来的一般。

若有若无的诗意是海飞谍战小说的显著特点。书中的苏门可以说是一个集诗意于一身的女子，她一出场就带着江南的书卷气息。她原名苏窗含，取自“窗含西岭千秋雪”，而后她改名苏门，可想而知是取自下半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两个名字都深藏着美丽与诗意，与她身上各式各样的缎面丝绒旗袍和黛染霜花高跟鞋十分相衬。在战乱的年代里，苏门一直保持着阅读《飞鸟集》的习惯，她与赵前定情的诗句“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来是相亲相爱的”，有着深层次的指向——迷雾重重的上海是一段荒唐的梦境，各方势力尔虞我诈、相互斗争，却忘了彼此之间本是同根而生，大梦终醒之时，所有人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本该相亲相爱、共同对外。

体验精神世界被照亮的瞬间

——评张悦然《顿悟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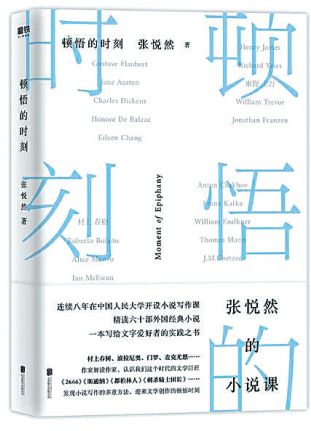
□夏丽柠

阅读，是人类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时间到了21世纪，无论从创作小说还是阅读小说的角度，我们仍然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我们为什么阅读小说？小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顿悟的时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出版）是张悦然精心写给所有阅读者与创作者的一本书。她在前言中说：“这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小说写作中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则围绕国外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展开。”

写给创作者，无非是讨论小说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张悦然从人物、冲突、情节、视角和结尾五个方面，探讨了小说家迷失在创作里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也给读者提了个醒，那就是，有时我们阅读起来不舒适的部分，可能是小说家的情感世界无法抵达的地方。毕竟，情感是支撑小说的重要部分。然而，这个支点或包容或狭隘，都需要读者去认同。能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幸福的阅读体验。

正如英国学者约翰·萨瑟兰所说：“小说能做到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便是自我探索。这仿佛是小说作者与自己的一场游戏，在其中，小说作者不断试探着自己的边界和试验着各种技法。”可对于读者来说，读小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这恰似与作者在角力。阅读过程中，读者不知道



将会遇到什么，谁会是下一个出场的人，主人公的心路要走向何方。读者常常担心喜欢的人物会被作者“黑化”。这是小说本身人物设定的冲突，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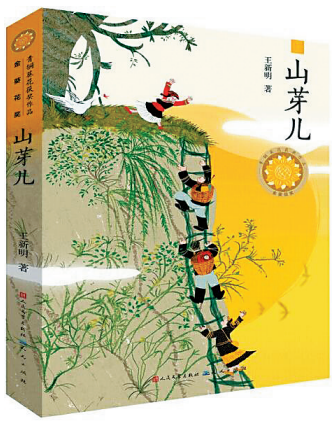
世界是广阔的，人类是千人千面的。作家写小说不是为了塑造一个生活模本，而是为了让读者抵达一个未知的世界。张悦然在书中的一句话道破了人类的脆弱，“现代社会的恐怖之处，正在于我们无法自行定义我们的幸福”。也许，就在小说家与读者关于文本的进退之间，双方都找到了一个顿悟的时刻，即为精神世界被照亮的某个时刻。然而，当这个时刻出现之后，虽然读者仍对小说的结尾有所期待，但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小说家与读者就像一对台上的舞者，一曲终了，相互鞠躬谢幕。

第二部分涉及的五位国外当代作家是村上春树、波拉尼奥、艾丽丝·门罗、伊恩·麦克尤恩和珍妮弗·伊根。这几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各有所长。她认为，村上春树的文学正好与桑格塔相反，是“健康的隐喻”。笔者深以为然。村上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作，如今，年逾古稀，仍然笔耕不辍。他就是不断向上的精神化身。坦白讲，中年以后的村上小说没有逃脱“挪威的森林”的青春幻影。但全世界的村上迷仍翘首以盼偶像新作全世界同步发售的那一刻。这不仅是村上的胜利，也是小说的胜利。小说的魅力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向读者的心灵弥漫开去。

我们为什么读小说？或许，只是为了寻找超越生命的感受，为了体验精神世界被照亮的瞬间，以及顿悟的幸福时刻。

悬崖上的成长风景

——评王新明《山芽儿》



□余　雷

阿土列尔村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的一个自然村，它地处几千米高的悬崖上，交通闭塞，村民进出村子，曾经要爬落差800米的悬崖。小说《山芽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就是以孤悬在几千米高的悬崖上的彝族“悬崖村”为背景，围绕两位彝族少女阿嘎和依呷展开叙述，把她们的个人成长和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贴合“精准扶贫”的社会现实，弘扬努力、自强的正能量。两个彝族少女就像大山上的嫩芽，虽然柔弱，但又无比坚强。

阿嘎和依呷从小在山上的火塘边长大，目睹了这个村子的变化与发展，经历了成长的伤痛与欢喜。小说里的很多场景对她们而言都充满着隐喻。

第一个有意味的场景是藤梯，它是阿土列尔村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虽然村民能依靠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用现代通讯工具与外面联系，但年久失修的藤梯让山下的姑娘不愿嫁到山上，山上的病人无法及时运送到山下，依呷的父母也因藤梯而丧命。时代在发展，先辈绝对没有预见到，曾经令人骄傲的防卫天堑，如今却成为村民获得幸福的阻碍。

对于村里的孩子而言，藤梯是他们走出大山的第一步。村里的孩子们每周通过这条藤梯到山下去上学，周末再从藤梯回到家里。这条藤梯对村里的下一代而言，是他们通往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唯一路径，山下的世界给了他们更多向往和选择。

阿嘎因为要照看家人，从来没有走下过藤梯，山外的世界对她来说是陌生的。阿妈因难产去世，阿嘎担负起家庭的所有责任。很多次她觉得快撑不下去了，但看到幼小的弟弟和妹妹时，又咬牙坚强起来。阿嘎本以为自己会像其他女孩一样早早嫁人，过和阿妈一样的生活。但小姐妹依呷的鼓励、山下小学杨阿柳老师的指导、布喜姑姑和村里人的支持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阿嘎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彝族绣法的探索，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当她把自己绣花的钱捐出来搭建钢梯时，阿嘎打通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她第一次走下悬崖，走出阿土列尔村，投入崭新世界的怀抱。

第二个场景是火塘。彝族人的火塘常年不灭，被称为“万年火”。不仅可以取暖、烧饭，也是彝族人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祖祖辈辈流传着“生于火塘边，死于火塘上”的说法。可是，随着村里不断有人搬到山下，燃烧着的火塘就越来越少了。昂鲁的父母到城里去了，因为受伤只好把昂鲁送回村里暂住。昂鲁在夜里偷偷返家时摔下悬崖受了重伤，他的父母发誓再也不回这吃人的阿土列尔村。石旮送依呷和小羊回家时摔下悬崖，受到惊吓的他决定再也不从城里回来。人们不再心甘情愿地守着祖祖辈辈燃起的火塘，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第三个场景是老龙树。这是一棵让村里人敬畏的大树，独木成林的大树是整个村子的根。这棵大树见证着阿土列尔村的发展，村里人常常到老龙树下说他们的心事，讲他们的打算。老龙树就像村子里的长者，默不作声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用自己蓬勃的枝叶和挺立的树干为村民们祝福。依呷和阿嘎就是在这样充满生机的环境中成长的，苦难的生活因此有了更多的诗意与美好。

作家奈保尔曾说，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作者不仅描述了具有代表性的阿土列尔村人诚实守信、互助互扶、敬老爱幼的淳朴民风，也描述了以阿嘎和依呷为代表的娃娃们，虽然过早地承受着生活的磨砺，但是在较为落后和贫困的条件下，仍有着不泯的童心和童趣，顽强地成长着。他们像悬崖上茁壮的草芽儿一样，在困惑与迷茫中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